

鲍廷博

周生杰 著

藏书与刻书研究

BAOTINGBO CANGSHU YU KESHU YANJI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鲍廷博

周生杰 著

藏书与刻书研究

本书是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项目编号AHSK07-08D141）、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清代徽商藏书与刻书个案研究——以鲍廷博为中心」（项目编号1001048C）的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 / 周生杰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11.4

ISBN 978 - 7 - 5461 - 1745 - 4

I . ① 鲍 … II . ① 周 … III . ① 私人藏书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② 清刻本 - 研究
IV . ① G259. 258. 3 ② G259. 294. 9 ③ G25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890 号

本书获淮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

周生杰 著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周振华 秦矿玲

责任印刷:李 磊

装帧设计:陈 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 - 3533768 3533762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 - 2827094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13.5

字数:400 千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461 - 1745 - 4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寅恪先生一直极力称道宋代学术、思想、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一则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再则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赠蒋秉南序》）。而为陈氏所推重的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也肯定“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宋代金石学》）。毋庸置疑，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主要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化发展进步长期积淀的自然结果，与很多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可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日渐普及应该是宋代文化发展一个重要的推手。雕版印刷术是结合印章和捶拓技术发展而来的，早在唐代，就已有人把碑版文字刻在木板上传拓，只不过印制主要是日历、佛像、佛经及少量诗文。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等上奏疏：“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册府元龟》）唐明宗遂敕令刻印西京石经，广颁天下。而孟蜀宰相毋昭裔也在蜀中出私财募工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大宗书籍印制这一事件，翻开了中国文化史全新一页。

雕版印刷代替古老的手工抄写，彻底改变了我国书籍形成、流通与文字传播的方式，使得书籍数量迅速增加，传播途径趋于简化，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更多的学者能够相对方便的得到书籍，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思想学术日益繁荣。自宋代以后，迄于清代，雕版印刷业持续发展进步，形成了官刻、坊刻、私刻三大系统，刻书地区也逐渐遍及全国。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刻书中心汴梁、福建、四川、平水等地，刻书业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中衰，只有江浙地区的刻书业则绵延千年，至近代犹繁盛不衰。清初学者金埴在《不下带编》

中说：“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白下、吴门、西冷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冷次之，白下为下。”王士祯《居易录》亦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郭丘墟，都无刊书之事。”所以，只有江浙地区是长盛不衰的全国刻书中心。

两宋也是我国人口稠密地区、经济重心与文化先进地区南移的关键时期。自唐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黄河流域遭遇了前古未有的剧烈破坏，大批北方移民南迁，如李白《永王东巡歌》所描绘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靖康之役，宋室南渡，“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宋史·忠义传》），“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江南人口稠密度不断增加，而长江三角洲地区更是成为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极大地刺激并推动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增长，唐代后期，“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吕温《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北宋“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江南）九道供亿使之然尔”（富弼《上仁宗乞东南诸郡募兵以防寇盗》）。南宋以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已远远超过北方，所谓“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食货志》），南方完全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是在唐宋之间，南方的文化水平已经逐渐超过北方，南宋时，原来开封——洛阳一线文化精英的南迁，多寄居于江浙地区，“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成为我国新的文化先进地区，正如洪迈在《容斋四笔》中所说：“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张家驹、何祐森、谭其骧、何炳棣、范金民等学者对两宋至清代我国文化人才的地理分布做过细致的统计，并深入研究了形成的原因。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北宋宰相出于北方者 41 人，南方 31 人；南宋宰相出于北方者 5 人，南方 57 人。而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等的地理分布情况与政治家大致相当。元朝时期，浙江在多项文化指标的累计数值上占有优势地位，其次是江西和福建。晚明，东南四省（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是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南直隶、浙江

更是人文渊薮，尤其是南京、苏州、扬州与杭州，是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中，就有一人出自江南，明代状元的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的半数以上都出自江南，而杭州清代的进士总数则多达1004名。

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我国的私家藏书风气也发生了同向的地域变化，两宋时期，南方藏书家的数量超过了北方，江浙地区兴起为全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区域。根据周少川《藏书与文化》一书的统计，两宋时期，全国332名藏书家中，有101人在江浙地区，占总数的30%；明代全国405名藏书家中，江浙藏书家262人，占65%；清代全国922名藏书家，江浙有526人，占57%。更为重要的是，“宋元明清数代，但凡收藏宏富、典籍精善的大藏书家，大部分出自江浙两地”。所以，江浙地区的私家藏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全国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杨立诚、金步瀛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上起秦汉，下迄清末，共收入历代藏书家741人，俞运之《校补》又增加134人，都874人，大部分属于江浙地区。据我的粗略统计，其中苏州及倚郭吴、长洲、元和三县计103人，杭州及倚郭钱塘、仁和二县计96人，两地合计199人，占全国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如果仅计明清两代，则其所占比例还要大得多，可见江浙地区私家藏书又集中于苏、杭两地。著名藏书家层出不穷，父子、祖孙、家族、亲友相传，藏书风气愈演愈烈，又强势推动了学术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两者交相影响，良性互动。

鲍廷博正是在江浙地区良好的学术文化与刻书、藏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著名藏书家。鲍氏籍贯安徽歙县，但自小从客居杭州经商的父亲，居于杭州。自弱冠始即购求图籍，孜孜以求，尤其注重“未刊”之孤本、善本之搜求，积30余年而洋洋大观，遂成浙西藏书名家。《四库》之役起，鲍氏响应朝廷征求图书的号召，以家藏精品六百馀种由其子鲍士恭进上，由此被称为“献书之冠”。其实，乾隆皇帝亲自下诏“购求遗书”的事情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下诏，直到该年十月，并没有见到上谕所要求的各地将“各书叙列目录……具折奏闻”之结果，各省督抚中，只有贵州巡抚有折上闻，但主旨是“查明黔省鲜有书籍可供采择”。所以乾隆又让大学士刘统勋再次分寄上谕给各省督抚，重申前谕，口吻严厉，并特别强调“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应

加紧办理。十一月，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上折，一方面解释迟误缘由，并叙列 56 种进书目录上奏，同时说“惟是浙江为书肆最多之区，恐尚有藏书者，未必尽皆购出”，可见地方官员采访图籍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乾隆的第一次上谕即强调地方对一些珍贵古籍，应“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借端滋扰”，但是从各地督抚所上奏折来看，私人藏书家仍有种种顾虑，“恐珍藏秘本，交官后转致遗失稽留”，所以访购结果依然不佳，“奏到者寥寥”。到三十八年三月，遂有第三次上谕，严格规定期限，“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特别谕示两江总督高晋等于江浙迅速购访遗书。四月，鲍士恭、吴玉墀、汪启淑等即“踊跃呈献”（以上均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鲍氏更是呈献 626 种之多，对购访活动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一时声动朝野。

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很大的藏书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虽然各种研究、叙述文献家或藏书家的著作都会提及，时而也有介绍性的文章见诸报刊，但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与研究。可喜的是，刘尚恒先生《鲍廷博年谱》最近由黄山书社出版，为鲍廷博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系年依据与资料；现在，周生杰博士新著《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也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可谓珠联璧合。

《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考鲍廷博身世生平，举赵怀玉《恩赐举人鲍君墓志铭》，印证了刘尚恒鲍廷博生年为清雍正六年（1728）之说，交待了鲍廷博上自祖父、下至曾孙六世传承，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鲍氏知不足斋藏书聚散和三世接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情况。详交游书事，勾勒鲍廷博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及学者，如卢文弨、黄丕烈、王鸣盛、汪辉祖之间的交往。全书的重点则在紿绎鲍氏藏书与刻书思想，分析知不足斋藏书的特色，介绍典籍的校勘情况、《知不足斋丛书》的刊刻及特点，宗旨在于凸显鲍氏藏书、刻书与乾嘉主流学术的关联及其巨大的学术文化影响。钩沉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搜检出 91 种未列入《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计共六百二十六种》中的书，从而纠正了传统的鲍氏进书 626 种的说法，证明鲍氏进书至少在 717 种以上，且进书当非仅一次。特别是以附录的形式将“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丁、陆、黄书目题跋著录鲍氏藏书”、“台

湾‘中央图书馆’收录鲍廷博藏书情况”等资料系于相关正文之末，既可突出鲍氏藏书的价值，又可起到索引指南的作用。所以，该书将鲍廷博研究明显提高了一个层次，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而生杰博士还在从事鲍廷博藏书与刻书题跋辑录工作，假以时日，得以与前述两书匹合，鼎足而三，必将奠定坚实的鲍廷博研究之学理及资料基础。

生杰博士好学敏思，负笈八桂，游学白下，从名师治学，精研《太平御览》，创见良多。博士毕业来淮北师范大学任教授学，甫及下车，即查藏书，访耆老，问故实，有志皖省先贤达人研究与乡邦文献整理。逾年，“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鲍廷博藏书与刻书题跋辑录”接连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规划立项，实乃精诚所至。立项不到两年，一部近30万字的书稿又告完成，字里行间，是博洽的学术修养、缜密的逻辑思辨，更多的则是辛勤的汗水，所谓后生可畏，然更可敬。稿竣伊始，周博士即命序于我，以我之学养学力，本不克此任，然坚辞不果，乃勉为其难，谰言于上。是为序。

牛继清

于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2010年立冬

目 录

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藏书与刻书之背景及思想	006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	007
一、家世述略	008
二、主要行实	015
第二节 社会文化背景	024
一、清代学术	024
二、地域文化	028
三、私人交游	033
四、藏书名楼	054
第三节 藏书与刻书思想	066
一、感恩之情	067
二、不言获利	069
三、以散为聚	073
四、服务朴学	078

第二章 藏书研究	087
第一节 藏书来源	088
一、倾力购买	088
二、辗转借抄	098
三、赏赐馈赠	109
第二节 藏书特色	116
一、藏书特色	117
二、藏书举隅	135
第三节 藏书去向	143
一、突遭火灾	144
二、家贫变卖	146
三、无偿赠与	148
附录一：丁、陆、黄书目题跋著录鲍氏藏书一览	153
附录二：台湾“中央图书馆”收录鲍廷博藏书情况	161
第四节 藏书室与藏书印	170
一、藏书室	171
二、藏书印	176
第三章 献书研究	180
第一节 四库馆的成立与征书	180
一、成立缘起	181
二、清廷征书	185
第二节 献书清廷	187
一、献书经过	187

二、献书数量	189
三、献书之冠	193
四、献书分析	199
五、献书受赏	206
附录：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	209
第四章 校勘研究	234
第一节 方式方法	235
一、自己校勘	235
二、延请名家	240
三、校勘方法	247
第二节 校勘内容	254
一、校定书名	255
二、勘定著者	256
三、考辨脱文	258
四、是正文字	262
第三节 校勘理念	264
一、意改当慎	264
二、务求完善	267
三、以还旧观	272
第五章 刻书研究	279
第一节 《知不足斋丛书》的刊刻	280
一、刻书缘由	283
二、刻书时间	290

三、刻书方式	301
四、刻书受赏	307
第二节 《知不足斋丛书》的特色	310
一、种类多	312
二、底本优	317
三、内容全	333
第三节 其他刻书	344
一、襄刻《聊斋》.....	345
二、承刊诸书	353
三、单刻之书	356
附录：参编《委宛别藏》.....	368
第四节 刻书影响	369
一、丛书刊刻	371
二、助益考据	380
三、文化交流	397
馀论 鲍廷博辑佚成就述略	411
主要参考文献	418
后记	421

绪 论

01

绪
论

古代藏书文化中,藏书楼(书斋)承担着储藏书籍和提供阅读场所的作用,古人建造藏书楼始于宫廷,从汉朝开始,历代宫廷的藏书楼皆有专名,汉之天禄、石渠,唐之弘文馆,宋之崇文馆,明清之文渊阁,皆储藏丰富,为历代学者称颂。古代私人藏书是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出现而兴起的,宋代以后,私人藏书的数量不断增加,于是私家藏书楼随之兴建,亦多有专名。与宫廷藏书楼名稍有不同的是,历代私人藏书家都很讲究私家藏书楼的命名,他们通过书楼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因此,古代学者的藏书楼名千奇百怪,花样迭出。其中,清代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知不足”作为书斋的名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书斋命名的文化现象。

“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话出自《大戴礼记·学记》,郑玄注释为“学则睹己行之所短”^①,所谓“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辩证地解释了“学”与“知”的关系,尤其是提出了通过“学”来提高认识的途径,得到了古今人士的普遍认可。私家藏书楼命名为“知不足斋”,隐含着对于藏书和知识永不满足的意思。

乾隆年间,江宁诸生吴国俊才华横溢,他与随园主人袁枚结识,深受袁枚器重,二人诗酒唱和,成为忘年交。袁枚有个孙女名袁绶,字紫卿,很有文采,经袁枚的主张,嫁给了吴国俊,这样,袁、吴二人成为了翁孙婿的关系。几年后,吴国俊科举得中进士,曾任福建南

^① 《礼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2页。

平知县。吴国俊家境并不富裕，但是酷爱读书、藏书，而夫人袁绶自幼受到祖父熏陶，亦能诗文，夫妻二人藏书、读书，其乐融融，时常唱和，颇有宋代赵明诚、李清照之遗风。他们将多年的积蓄尽行购书，家中藏书累案盈牍，名其书室为“知不足斋”，寓仍不满足之意，一时传为佳话。

嘉庆年间，云南建水一位书生名叫刘士珍，号春舫，他虽然出生在边远之地，但是自幼向学，十分仰慕中原文化，一心要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于是远涉他乡，参拜名师。他无钱购书，只是辗转借阅，他将寒舍命名为“知不足斋”，斋中藏书可谓名副其实的“不足”。经过多年的苦读，果不其然，嘉庆九年（1804），刘士珍参加乡试时一举中第，成为了建水县为数不多的几位举人之一，后任香河知县。刘士珍一生酷爱诗作，晚年曾将作品汇编成册，名为《知不足斋诗钞》，部分诗作被《晚晴簃诗汇》收录。

和刘士珍一样，同治年间，广东南海县人邓翔寒门出身，地处边远，藏书不易，但是，只要能够索见，他一定设法购得，资金不足就亲自手抄，寒暑不辍，积少成多，藏书逐渐丰盈。邓翔的书斋也是取名“知不足斋”。咸丰十年（1860），邓翔将自己多年的诗作结集出版，交由广州富文斋书坊剞劂，书成后，邓翔用自己的书斋名名诗集曰《知不足斋诗草》，该诗集共10卷，一时当地士子争相阅读。

除了上述学者斋名之外，彭元瑞、杨承德、潘铭宽、萧锡龄、龚宪曾等人的书斋或藏书室也取名“知不足斋”，所命名的缘由大同小异。还有的学者虽然不是直接以“知不足”名其书室，但是斋名却与“知不足”近似，宋人杰、陈粲、程光熊、叶绍闻、宝琳等人斋名为“知足知不足斋”。几人中，宋人杰、陈粲、程光熊为书画家，各有作品传世，而宝琳则是满族诗人，祖籍长白山佳氏，一名马佳氏宝琳，10岁时即随其父马升寅迁居沈阳，一生著述颇富，所作诗结集为《知足知不足斋诗存》。

与此类似，清代还有很多学者的书斋名称中包含有“知足”二字。单就“知足”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老子》云：“知足不辱。”

即指对物质享受、名利、地位,要知道满足,不能贪求,知足才不致受屈辱,既包含“明哲保身”的思想,也蕴含着抑制非分欲求、保持身心和谐的合理内核。将“知足”和“知不足”结合在一起名书斋,可谓一种创意了。这类书斋名计有“知足之斋”(谢元淮)、“知足知不足轩”(王赠芳)、“知足知不足馆”(王绍兰)、“知足斋”(朱珪、王璞、黄奭、蔡云瑞)、“知足知止斋”(胡方朔)、“知足轩”(福永),等等,名称虽殊,寓意一也。

当然,提起“知不足斋”之名,最著名的还是鲍廷博其人,这位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书籍事业,知不足斋是其藏书斋名,也是校刻的丛书名,随着丛书的刊刻流布,“知不足斋”之名名闻天下,其中,还有一段与皇帝斋室名称相同而引发的故事呢。

嘉庆十七年(1812),鲍廷博所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传入内廷,有人指出这个斋名不妥。原来,嘉庆帝宫禁的藏书处亦名“知不足斋”^①,但是,嘉庆帝十分喜爱刊刻精美、选材独到的《知不足斋丛书》,而且他也不像乃祖、曾祖那样动辄兴起文字狱,因此,听到臣下的指摘后,不禁莞尔一笑说:“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②后来,嘉庆帝在一首诗中咏其书斋,诗题为《内府知不足斋》,云:“斋名沿鲍氏,《阙史》御题诗。诗书若不足,千文以序推。”^③直接说明自己的书斋名是沿袭鲍廷博而来,可以想见鲍廷博知不足斋名气之大。

清代统治者喜欢鲍廷博这样的藏书家,这也是推动各地私家藏书、刻书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清代学者继续前代的优良传统,

^① 刘尚恒先生云:“据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2005年4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清宫藏书处为昭仁殿(天禄琳琅所在)、五经萃室、四库馆和摛藻堂,未见有知不足斋藏书之处,故所谓内廷知不足斋或为嘉庆皇帝一时兴起所设,或为其小规模的书室名号。”见《鲍廷博年谱》,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六“渌饮先生”,《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册。

^③ 清嘉庆帝之诗见阮元《掣经室集》二集卷五《知不足斋鲍君传》所引,又载《光绪桐乡县志》卷首二“天章”。

更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藏书事业方兴未艾，近代学者杨守敬描述这一盛况说：

艺圃腾辉，断推昭代。若绛云楼之未火，述古堂之继兴，文字垂光，烂若球贝，犹未已也。聿观常熟之毛、泰兴之季、昆山之徐、天一阁范氏、澹生堂祁氏、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小读书堆之顾抱冲氏、五砚楼之袁寿皆氏、滋烂堂之朱文游氏、百宋一廛之黄莞圃氏、长塘鲍氏、棟亭曹氏、香岩书屋周氏、艺芸书社汪氏、开有益斋朱氏、爱日之庐、碧风之坊、楹书之录、行素之堂、孙氏之祠堂、影山之草堂、瓶花之斋、嵇瑞之楼、拜经之楼、赐书之楼、铁琴铜剑之楼、观海之楼，为世宝称，后先继出。^①

文中的“长塘鲍氏”即是鲍廷博其人。这位和常熟毛晋、宁波天一阁范钦后人、元和顾千里、吴门黄丕烈、常熟瞿镛、聊城海源阁杨以增等齐名的藏书家，时人多有赞誉，《清史列传》和各地方志有传略，阮元、卢文弨、朱文藻等学问大家对其拳拳服膺，各自在文集中对鲍氏藏书和刻书情况有记述。但是，如此之文献大家在今天的学术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文集散落已成遗憾，而研究者对其只是泛泛地论及。近年来，关于鲍廷博主要的研究论文有：郑伟章的《鲍廷博知不足斋刻书》^②，张弛的《浅评清代藏书家鲍廷博》^③，何庆善的《评〈知不足斋丛书〉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④，张健的《鲍廷博与“知不足斋丛书”》^⑤。此外，一些文献著述，如《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著，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文献家通考》（郑伟章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徽州刻书与藏书》（刘尚恒

① （清）杨守敬《藏书绝句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载《中国出版》1989年第8期。

③ 载《图书馆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载《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⑤ 载《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5年第3期。

著,广陵书社2003年版)、《徽州藏书文化》(薛贞芳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徽州文化全书》(系列丛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对于鲍廷博有提及,但没有专论。上述的研究只是将鲍氏作为一位成就不菲的古代藏书家和刻书家作简单的介绍,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再稍早一些,清人王立中曾经从有限的方志和《知不足斋丛书》题跋中,编著《鲍以文年谱》(清钞本,安徽博物馆藏),十分简略,没有深入的考证资料,大段的年代属于空白,这与鲍廷博本人在藏书和刻书上的重要地位十分不匹配。由此看来,对于鲍廷博其人与其藏书和刻书,需要经历从基础资料的汇集到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样一个过程。

“历史是一条长河,任何个人不过是长河中的一个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轮在长河上由古驶至今,还要驶向永远。它,就是书籍!”^①的确,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最离不开的当数书籍。而大量书籍的保存和流传又离不开辛勤的文献学家,是他们倾毕生之力,怀着挚爱之情,孜孜矻矻地进行着聚书、抄书、校书、刻书、辑书、编目、题识等艰苦工作,才将文化传统代代延续,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昌盛事业做出了不朽之贡献。鲍廷博就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①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